

赣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

自1978年以来40多年的中国改革事业是由农村起步的,而农村改革的起点正是包产到户。从改革的发起到推行,再到向更深、更广发展,最后形成国家农村政策的一项基本制度,集中体现当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充分尊重人民群众意愿,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科学态度和做法。

1979年秋,赣州地区有的地方开始试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后被统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包给各家农户独自使用,农业生产形式因此由过去的集体生产、统一经营转变为农民的分户经营、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形式,不但适应了农村小块分散的耕地状况、多变性和多样化的农业生产特点以及基本手工劳作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而且实现了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紧密结合,使农民获得生产和分配的自主权,其责、权、利得到紧密的结合和清晰的界定,平均主义、大锅饭问题被完全消除,受到了农民的热烈的欢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比如,兴国县长冈公社富大队文溪生产队,由多年的包产到组改为包产到户,粮食增产幅度超历史;寻乌县罗塘公社上津大队新屋队等10个生产队包产到户后,广大社员劳动积极性明显提高,当年产量超过预期。此外,兴国县的甘蔗、广昌县的莲子以及各地的脬豆、油菜等种植实行户种户收后,效果明显,产量创新高。至1980年夏,全区实行“双包”责任制的生产队已有1000多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2%。

在这个过程中,全区农村形势是好的,思想也是活跃的。但是,面对着势头强劲的包产到户,少数干部、群众思想仍未想通。特别是在部分干部中有争论,有的说“旧社会单干多少年都没见农民都富起来”;有的说“搞包产到户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干”;有的说“等红头文件来了再干,不要抢先”,等等。针对这些反映,中共赣州地委强调,要通过实践进行调查研究,在实践的过程中统一认识。通过实践和调查,大家逐渐明确了农民为什么选择包产到户责任制的道理。

1980年7月底,中共赣州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会议,决定组成三个工作组到定南、兴国、瑞金进行责任制的调查,各县(市)、各部门也应组织力量进行责任制的调查,在8月15日以前拿出调查报告。

随后,中共赣州地委主要领导和有关领导分别带队到定南、瑞金、兴国调查生产责任制。因定南县受邻近广东省和平县包产到户的影响,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搞包产到户。在定南调查期间,中共赣州地委领导到广东和平、龙川县两县实地参观后,深受启发。8月14日至15日,中共赣州地委常委以及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听取赴兴国、瑞金、定南等3个调查组汇报。调查组一致反映:从调查情况来看,全区尤其是那些贫穷落后地方,绝大多数群众都要求坚持包产到户。群众反映包产到户是“驼背子下山,势不可挡”“第一年解决吃饭,第二年解决用钱、第三年搞点基本建设”。对包产到户具体问题的处理,群众认为并不难,他们说:“几瓶开水一碗豆,队长出题大家凑,七嘴八舌几小时,统一思想就拈阄。”8月底,中共赣州地委召开会议,认为包产到户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应同其他责任制一样,要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不搞“大呼隆”,不搞一刀切,不搞简单化;在困难、落后的地方,尊重群众意愿,不硬性规定比例;凡是搞包产到户的地方,要加强领导,创造条件,逐步引导向专业化分工协作的方向发展。

1981年1月2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发表了《江西三位地委书记谈体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就有决心落实政策》的文章。文章中,时任中共赣州地委书记杜昭说:“落实政策,进行改革,都要从实际出发。要做到从实际出发,就要搞好调查研究。经过一段调查,我们宣布,凡是能调动农民积极性、促进增产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都是可行的。今年推行哪种责任制,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由生产队自行决定。对包产到户宜‘疏’不宜‘堵’,要让农民吃‘定心丸’。”

据统计,1981年5月,全区包产(包干)户由原来的13293个队发展到27701个队,由占生产总数的23.9%上升到49.3%;小段包工、定额计酬由原有的23755个队减至15169个队,由占生产总数的42.7%下降至27%;包产到组、联产计酬原有14043个队减至9113个队,由占生产总数的25.2%下降至16.2%;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原有4563个队,占8.2%,下降至2243个队,占4%;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仅有1951个队,占3.5%。至1981年12月底,全区“双包”到户面积已达到95%,成为全省推行“双包”责任制最早和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1982年7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大包干责任制显示出巨大优越性,赣州地区五业兴旺,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报道,并配发了题为《大包干是一种很优越的生产责任制》的评论。评论指出,赣州地区农村全面推行大包干责任制后,不仅农村五业兴旺,而且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全区有98.2%的生产队实行了“双包”到户,1981年粮食总产突破了40亿斤,人均口粮达到537斤,结束了多年来吃返销粮的历史。文章还用了大量的事实说明,实行大包干责任制后,不仅把生产搞上去了,而且推动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掀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其伟大的实践意义和历史意义,已被载入党的史册。重温这段历史,找寻其中折射出的开展调查研究的宝贵精神,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今后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是有借鉴意义的。

□李春娟

一把马刀背后的故事

□钟秋梓

袋放到客厅的木沙发上,说:“这里面就是那把彭总留给我们的马刀。”

张耀茂从桌子前站起来,解开系住蛇皮袋口的绳子,从里面抽出那把马刀。经测量,这把马刀全长53厘米,刀柄12厘米,有椭圆形木手柄和护手,刀身最宽处3厘米,一边是刀刃,一边是刀背,刀背最宽处1厘米。虽然马刀锈迹斑斑的,但人们仍能想象出它当初的锋利。

“当时彭德怀总司令带领红军队伍离开我们家时,给我们家留下这把马刀。我们家一直珍藏着。”张耀茂告诉笔者。

1932年春,“赣州战役”失利。其后,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军西路军进驻犹崇苏区,于4月14日抵达营前镇,彭德怀总司令和司令部住营前镇。1932年6月20日,国民党湘敌王东原十五师从桂东出发,爬江西把,出五指峰,经黄沙坑,准备进犯营前苏区。为了打击敌人,保护苏区,彭德怀总司令决定利用石溪村洞尾和黄沙坑交界的伯公坳山势险峻、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设伏打击来敌。红三军团教导营会同地方游击大队、赤卫军、少先队扼守伯公坳,迎战敌人,消灭敌人200余人,把敌人赶出了苏区。为打好这一战,彭德怀亲自在离伯公坳不到10里远的张氏祖屋坐镇指挥,同时组织

张氏及周边群众积极做好后勤保障、运送伤员等工作。敌人败退后,彭德怀离开张氏祖屋时,给忙前忙后帮忙搞后勤的张耀茂的爷爷张兴发留下一把马刀,并对他说:“这把马刀留给你们,以后遇到敌人和坏人,你们可以拿来防防身。”

张兴发兄弟5人,当时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看到彭德怀亲自在他们的祖屋指挥战斗,把敌人打了个落花流水,也感受到红军队伍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见总司令给他们家留下了马刀,老二兴云、老三兴菲当即就要跟着去当红军。堂哥张兴顺虽然已经结婚生子,看到他们想去当红军,便也和他们一起加入了红军队伍,最后都壮烈牺牲了。而今,在上犹营前革命烈士陵园的烈士英名墙上还刻写着张兴云、张兴顺的英名。

作为老五的张兴发见哥哥当兵去了,心里虽然也很向往,最终选择待在家中,把彭德怀留下的马刀收藏好。他后来结婚生子,把马刀作为传家宝传给后人,要后人铭记马刀的来历。

烽烟散尽,烈士不朽。在营前镇政府和上犹县文物部门争取申报下,2022年7月,江西省政府公布张氏祖屋为“石溪乡苏维埃政府旧址”,列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2021年核定)。对此,上犹县镇两级也高度重视,准备申报资金加以修缮保护。

苏区时期的中央图书馆

□钟同福

1932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东路军攻克了闽南重镇漳州,在这里停留了49天。不仅缴获了国民党张贞部包括飞机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还在漳州图书馆和龙溪中学等处收集了大批图书、报刊资料。一生酷爱读书的毛泽东如获至宝,指示红军把这些宝贝运回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叶坪。以漳州战役收集的大批图书、报刊资料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建立了中央图书馆。

中央图书馆的建立,是苏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前的1929年10月26日,永定县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和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创办图书馆和阅览室等地方书报管理机构。同年12月,共产青年团闽西特委各县宣传科第一次联席会议,提出每县要有一批较大规模的书报社。1930年1月17日,中共赣西南特委把建立内部图书馆列入宣传中心工作计划。8月,中共闽西特委在《关于宣传问题草案》中提出,闽西和各县政府设比较大规模的图书馆,各乡村设立通俗图书馆一所,并要求“通俗图书馆要广泛的搜集各种通俗的图书画报、小册子等,供给群众所需要而适宜的读物”。在整个中央苏区,除县以上苏维埃政府创办的图书馆以外,一些机关、学校也设立了图书馆,以供本单位工作人员学习和查阅资料。比如1929年3月,共产青年团江西省委创办的图书馆;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建成的图书馆等。

中央图书馆成立后,开展了图书征集、收藏和借阅等工作。在原有基础上,中央图书馆采取团体或个人赠书和向社会购买等方式来进一步丰富馆藏。为此,中央图书馆相继在《红色中华》上刊登赠、购书启事,函征各机关团体赠送书籍、刊物,采购“特别优良图书”,得到各方面的响应与支持。仅1932年9月至10月,中央图书馆先后收到中共苏区中央局、少共中央局、红军

学校、少年先锋队总队部、红一军团和中央发行所、反帝总同盟等机关、团体捐赠的数十种图书和刊物,其中有:《红军战士》《革命与战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职工运动指南》《簿记学》《粮林经理教程》《野战筑城教范》《青年实话》《反帝战线》等。

中央图书馆配有专职干部管理图书及借阅工作。中央图书馆开放后,来馆借阅的读者络绎不绝。为了加强图书馆管理,健全借阅制度,1932年9月1日,中央图书馆制定颁布了《图书阅览规则》和《图书出借规则》两个规定,对图书的借阅手续、图书管理办法作了详细的规定。规则的制定颁布,使图书管理工作有章可循,逐步走向正规。

中央图书馆开放后,不仅向广大军民开放,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更是中央图书馆的忠实读者,经常到这里借阅马列著作和文史类书籍。1932年冬,毛泽东在长汀福音医院治病休养期间,开列了一张借书单,专门派警卫员陈昌奉回瑞金,请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到中央图书馆借了《两个政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几十本书,带到医院阅读。瞿秋白到瑞金任中央教育部部长后,也非常关心中央图书馆的建设,经常到馆借阅图书和指导工作。

除此之外,中央图书馆还开展了邮寄图书的业务,这对于在前方浴血奋战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一本本图书通过红色交通线送到广大红军读者的手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央图书馆藏书装箱隐藏在瑞金西部的高��村,后被国民党发现,掠走33箱。值得庆幸的是,瑞金解放后不久,原来散落在民间的中央图书馆藏书陆续找回,并集中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目前,存留至今的原中央图书馆藏书共计1429册,报纸、杂志303份,其他文书333份。

陈必凯:坚贞不屈志不移

□骆耀明 李海良

红色经典 ——赣南底色

他是崇义早期共产党员、党组织负责人,曾在上堡向朱德、陈毅汇报崇义共产党坚持斗争情况,并与陈毅一起赴上犹陂形将工农革命军第三营带回上堡参加整训;他聆听毛泽东、朱德教导,深入开展革命活动。他,就是崇义籍革命烈士陈必凯。

陈必凯,1903年出生于崇义县茶滩乡一户贫苦农民家庭,父母为了改变家庭境况,节衣缩食,借钱供其到私塾上学。陈必凯聪明好学,但两年后家里经济拮据,实在筹措不到学费,陈必凯不得不辍学,到杰坝街一个杂货店当学徒。此时,邓子恢在杰坝庆昌和号当掌柜。1923年,邓子恢组织读书会,联络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投入讨伐旧世界的战斗。陈必凯目睹黑暗的阶级压迫,很快就接受了先进的革命思想,开始积极参与革命运动。1926年12月26日,经陈赞雍、邓子恢介绍,陈必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崇义第一批共产党员。从此,陈必凯立志跟党走,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人吃人的社会。

入党后,陈必凯奔走于茶滩、杰坝、长潭之间,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发展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斗争。为了加强对农工运动的领导,陈必凯被补选为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此时,国民党崇义县县长蔡舒趁机恢复“石灰捐”,盘剥工农群众。4月28日,中共崇义支部决定发动五一武装起义,反对苛捐杂税。党组织安排陈必凯等到茶滩发动群众。5月1日早晨,陈必凯率茶滩农民协会会员和群众,冲破了反动军警的阻挠,潮水般涌向县政府,到城隍庙前的大坪场集合,揭露了蔡舒重征“石灰捐”的目的。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起义队伍缴获警察的武器,活捉了蔡舒。5月2日,崇义县成立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宣布实行“二五”减租,取消“石灰捐”以及其他苛捐杂

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5月下旬,国民党“清党军”进驻崇义,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重新笼罩崇义。陈必凯等共产党员、革命骨干被迫分散各地隐蔽,坚持革命斗争。

1927年11月7日,南昌起义军余部进驻上堡。潜入地下活动的陈必凯等得悉起义部队驻在文英、古亭、上堡的消息,悄悄来到上堡。陈必凯等向朱德、陈毅汇报了当地革命情况,并报告有一支武装滞留在上犹陂形,目前处境十分困难。会见后,陈毅主动要求前往联系,陈必凯毛遂自荐说:“朱司令,陈指导员是外地口音,路又不熟,我是本地人,路熟,让我一起去吧!”朱德经慎重考虑,同意了陈必凯的请求。11月9日,陈毅乔装打扮成富商,穿着长夾衣,由陈必凯带路,走了40多公里去上犹陂形,联系上了张子清、伍中豪。随后,他们将工农革命军第三营500余人带回上堡参加整训。

12月,中共赣南特委委员、于都中心支部书记丘偲和于都中心支部干事李英来到崇义,帮助崇义恢复党组织。12月底,党员会议在长潭圩太阳客棧秘密召开,陈必凯等10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党的活动,成立中共崇义特别支部干事会,陈必凯任杰坝乡党支部书记。

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进军。红四军在前一天就派出联络员在长潭找到陈必凯等人。陈必凯、廖祥得知红四军要进军崇义的消息,立即动员全体党员,带领杰坝街上的雇工、学徒和贫苦农民,把停靠在河边的木排连起,把各店铺的店门板扛来,连夜架起了一座临时浮桥,使红四军主力安全渡过大江。

1月18日上午,红军部队到达杰坝圩。当晚,毛泽东、朱德在余福源店内召集了当地党组织负责人和活动积极分子开会。陈必凯、廖祥等十多名共产党人参加会议。毛泽东、朱德调查了解了当地情况,传达了党的六大会议精神,对当前的斗争作了指示,要求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组织农协,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会

上,毛泽东、朱德还详细听取了地方党组织的情况汇报。陈必凯等提出,当地恶霸地主、崇义县县长邱佐棠横行乡里,无恶不作,不除掉他,群众发动不起来。

会后,根据群众要求,朱德命令李天柱营长率200多名战士,捉拿邱佐棠。陈必凯主动请缨,要求参加战斗,带路迅速包围了长潭湾坑子蓝屋,将邱佐棠捉拿归案。在红四军的帮助下,崇义党组织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了邱佐棠。

1月20日,红四军前委在崇义县城城隍庙背大草坪上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军民大会。上午10时许,毛泽东、朱德、陈毅在陈必凯等陪同下来到会场,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详细阐明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和红四军党部《共产宣言》的主要内容,号召军民团结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全国胜利。

随后,陈必凯在茶滩、长潭、杰坝等地广泛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农民协会,陈必凯任杰坝乡农民协会主席。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武装和苏维埃政权,陈必凯任杰坝乡苏维埃政府主席。

国民党当局对陈必凯恨之入骨,下令通缉。面对反动势力的疯狂打压,陈必凯仍然积极开展革命活动,率领游击队开展革命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驻军、靖卫团等反动势力,进一步扩大了党的影响。

1929年2月下旬,陈必凯在茶滩发动群众,途经崇义与上犹交界处茶滩赖坑时,与白匪保安团遭遇,寡不敌众,受伤被捕入狱,被押送至赣州。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陈必凯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在狱中的一个多月,陈必凯历经各种酷刑折磨,被打得遍体鳞伤。丧心病狂的敌人用刺刀在他身上猛戳,但依然没有从陈必凯口中逼出片言只语。敌人恼羞成怒,把陈必凯押赴刑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陈必凯拼尽全身力气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英勇就义,年仅26岁。1953年,陈必凯被江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革命烈士光荣称号。